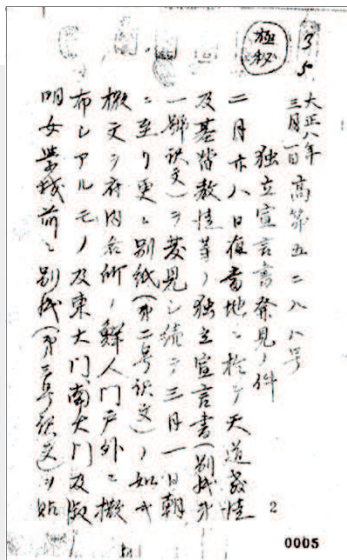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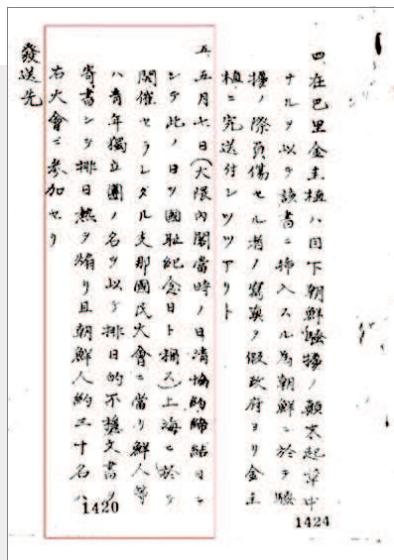




原敬

日本驻朝鲜总督府有关  
3月1日当天抗议活动情况  
的“极秘”报告在华日本谍报部门在给朝鲜总  
督府的报告中专门提及有韩国独  
立运动人士参与上海的国民大会

洲”在内的殖民地。然而，就在“大正德谟克拉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裁军的背景下，日本的军费却在逆势增长。原敬组阁时，日本陆海军事费占政府总岁出的13.3%。1920年即“三·一运动”后次年，军费占政府总岁出比例猛增至19.7%，1921年时又进一步上升至21.1%。在这三年间，日本最大的军事行动除了在西伯利亚地区干涉苏俄革命外，就是在朝鲜半岛的武力镇压与肃清。1921年11月4日，原本计划前往关西出席友会活动的原敬在东京站丸之内南口大堂遇刺身亡，凶手是一名右翼分子。原敬之死似乎成了“大正德谟克拉西”的一个“凶兆”，也预示着当时日本“政党政治”的梦想又或是“民本主义”的精神迟早都会被军国扩张的莽撞冲动彻底碾碎。

1926年，在韩国电影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阿里郎》上映，开启民族电影的黄金时代。这部以“三·一运动”为背景、充满着民族反抗精神的故事片，仅仅上映半年，观众已达110万人次。《阿里郎》的导演、主演罗云奎就曾因参与“三·一运动”而被捕入狱，1923年出狱后才开始接触电影。用韩国著名导演李庆孙的话来说：“上映《阿里郎》的电影院氛围，好比某个义烈团团团员在京城某个角落公开抛掷了一颗炸弹一样。”而“三·一运动”背后的不屈精神正如傅斯年所言那般成为了“朝鲜人最后胜利的预告！”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信息咨询与研究部竞争情报部副主任)

◀ (上接8版)

赞“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确的理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的新纪元。”傅斯年亦在《晨报》上撰文呼应：“实在算得上‘开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我们应当高呼‘朝鲜独立运动的精神万岁！’”，并感叹“回想中国真个可叹。一般没有自觉的，也不必说了，就是那些有自觉的，也还是心气薄弱的很。”

除了对韩国独立事业给予极大同情与敬意外，陈独秀还以“建议”的形式对日本当局的殖民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我们希望日本人，纵然不能即时承认朝鲜独立，也应当减少驻留朝鲜的军警，使他们有适当的自治权利”，甚至不无嘲讽地写道：“我想富于自由独立大和魂的日本人，对于朝鲜人这回悲壮的失败，都应该留几点同情的眼泪”。

“三·一运动”在日本政坛确实激起了极大风波。日本当局并未料想到在吞并朝鲜半岛近十年后，还会爆发一场胜过1918年“米骚动”的反日抗争运动。自1919年3月中旬开始，在日本国会的议场上，围绕所谓“鲜人暴动”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争论。既有众议员就此事件原委向原敬质询，也有贵族院议员批评朝鲜总督府执行所谓“善政”不彻底，才激化矛盾引发了“骚乱”。原敬在回应时，承认寺内正毅、长谷川好道先后两位“军人总督”以“武断政治”为主的殖民地政策确实存在问题，进而认为“朝鲜总督府官制有改正之必要”，故考虑变“军人总督”为“文官总督”。1919年8月日本政府正式修订《朝鲜总督府官制》，删去了要求总督必须是现任陆海军大将的条款。接任长谷川的新总

督是当时已转为预备役的原海军大将斋藤实，名义上勉强实现了“文官总督”的目标。实际上，在对台的殖民政策上，日本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几乎与斋藤实同时上任的新任台湾总督是贵族院议员田健治郎，而他也是台湾第一任文官总督。

然而，在改正官制的同时，原敬内阁却在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抗日、反殖民运动的镇压力度。首先，于4月针对“政治犯罪”制定了新方针，扩大了“政治犯”的认定范围。随之而来的就是警察规模的急速扩张。1919年9月，朝鲜总督府在半岛各地增加巡查（即基层巡警）1300余人，并计划最终扩充至25000人。与之相对，当时日本本土的巡查数量亦不过45000人，密度之高、管控之严可见一斑。此外，根据《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为了镇压独立运动，日本陆军至少增调了6个大队超过3000人兵力，同时另派有400名宪兵。之后，在陆军方面的强烈要求下，原敬内阁继承了大隈内阁时代制定的扩军方案，不仅同意在朝鲜半岛至少部署两个师团，还使之制度化。1921年4月，第19、20师团正式编成，分别驻扎罗南（咸镜北道首府）与京城。另值得一提的是，原敬内阁还通过修订《朝鲜军司令部条例》进一步扩大了总督权限：若事出紧急，总督可以绕过朝鲜军司令部直接调动、指挥驻扎朝鲜半岛的日军。

在整场“三·一运动”中，韩国民众的伤亡者数以万计，另有超过12000人遭逮捕。期间，发生过多次针对民众的屠杀事件，例如1919年4月15日的“水原屠杀事件”。当时，日本军警为了抓捕当地运动首谋，不惜残忍屠杀了至少29名普通

民众。之后，这桩暴行遭美联社记者、传教士揭露曝光，引发世界舆论哗然。原敬不得不公开回应，表示：水原事件将交由军事法庭审理。若属实，负责将校将接受处分。然而，涉事的日本军官最终均获判无罪。

至 1919年夏，“三·一运动”在各地引发的独立风潮已被日本当局所扑灭，但其思想冲击却影响着整个东亚。傅斯年就曾如此评价：“然而此失败与惨剧，即所以使朝鲜人永远不忘朝鲜，所以是他国人认识朝鲜人之团结能力，与不挠之意志，认识日本人无制驭朝鲜、同化朝鲜之能力。”因此“朝鲜独立，多一次之失败，则近于成功一步”。只要“朝鲜的独立未成，这种精神自必继续下去”。“三·一运动”后，大批韩国抗日运动人士流亡至中国，并于1919年4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1919年5月5日，在北京学生写给大总统请愿信中以朝鲜为殷鉴，称山东问题关系国家存亡，谁人不知：“日人利用我南北议和议不协，以对待朝鲜手段，利用李完用其人，隐为操纵。于欧洲和会提出强硬之主张，岂仅目无公理，直为亡国导线。我等与其坐而待亡，如朝鲜今日之现象，万劫千亿而不能复，孰若乘一息尚存之时，及早唤醒卖国之贼，以谋挽救。”在“五四运动”于中国各地如火如荼之际，相当多在华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也投身其中。5月7日，上海60多个社会团体联合举行“国民大会”，号召抵制日本对山东的侵占。会上，曾有30名韩国人以“青年独立团”的名义，散发反日传单，控诉日本殖民政策的劣迹。此事引起了日本在华谍报机关的注意，

甚至派遣情报人员潜入现场并紧急向朝鲜总督府报告了相关情况。

“三·一运动”后，日本不得不对“治鲜方针”进行调整，其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开始由“武断政治”向“文化政治”转变，提倡所谓“内鲜一体”——不仅允许殖民地人民建厂设业，还准许发行韩文报刊。伴随日本市民社会对“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想象以及民本主义在当时日本社会的流行，也曾有声音认为理应彻底反省日本的殖民主义政策。例如时任《东洋经济新报》的主笔、二战后曾成为首相的石桥湛山就公开撰文表达他对“三·一运动”的理解与同情，认为“三·一运动”是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甚至主张日本应该主动放弃包括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及“满



电影《阿里郎》(1926)海报